

廖省:林越

台湾地区疫情指挥中心22日公布,当天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21例,“校正回归”400例,台媒称其实日增700多例。截至目前,台湾累计3862例确诊,其中有2712例还住院治疗,累计死亡病例17人。所谓“校正回归”就是把400病例“回归”到前几天去分摊。从5月11日新北市狮子会前会长确诊仍外游,造成狮子会成员和万华茶室的感染后,台湾的疫情突然爆开,让台北的医院系统达到快要崩溃的边缘,市长跳出来直接取代卫生福利部长的中央决策,顿时让陈时中的外行、颞颥、甩锅、民粹的防疫思维摔下神坛。

《亚洲周刊》第21期笔锋“台湾防疫破口 地方挑战中央”的评论称:“台湾在面临变种病毒的第二波疫情时,仍旧沉溺于去年的防疫成功自满中,完全没有将争取来的一年抗疫时间用于疫苗的接种上,甚至前行政院长林全谈妥的疫苗备忘录,却因为民进党内派系的利益,在新北市某亲现任阁揆苏贞昌系的立委强力介入下,而胎死腹中。”

如今,台湾疫情在一周内本土案例破千,集中在台北和新北市,陈时中对暴增的社区感染束手无策,无论是设立快

台湾民进党不是“民主的天使”

筛站、建构负压隔离病房、医院院内感染、病床部署等,仿佛一年来全球的疫情毫无警示,他只顾吹嘘“超前部署”,对疫情的实际防控全无法。香港政论员童清峰在“绿营防疫破功8宗罪”写道:“苏贞昌引述美国彭博社及《时代杂志》皆报道台湾防疫是‘全球最佳纪录’,‘这项成就令全世界羡慕不已’。民进党相当自得,在全球口罩荒时,发起‘口罩外交’,称‘台湾可以帮忙’(Taiwan Can Help),如今好景不再,现在当台湾需要援助时,却很少看到有国家愿意伸出援手。”

绿营抗疫破功八宗罪:首先是缺乏危机意识,网上说:“疫苗没有,大规模爆发对策没有,筛检站没有。有的只会甩锅给政敌。”其次误判情势,陈时中的警觉性不高;面对变化莫测的新冠病毒,牙医出身的陈时中的“专业性”受到质疑。此外,防疫双标;台湾死硬派紧盯大陆,而对欧美等国疏于防范,卑劣地搞“双重标准”,最终落个自讨苦吃。

第四条罪,大内宣让民众防疫松懈;官方渲染就如让人服下迷幻药,全岛飘飘然,失去警惕性。球赛、夜市人山人海,“摸摸茶”的茶室成了防疫传播链。加上屈从立委压力,专业沦丧;强推航务员“3+11”优待的是政治明星前学运头目范云,指挥中心也“责无旁贷”。网友留言:“陈时中、时任交通部长的林佳龙、民进党立委范云都别想跑。”

第六条罪,疫苗短缺荒。外媒均指台湾施打速度太慢,接种率不足1%,在全世界几乎垫底。当恢复国际交流互动时,可能成为较高感染风险的族群。还有,防疫甩锅。因疫苗碰壁,陈时中想甩锅,说地方可以自己买疫苗;柯文哲怒批政府此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后,领导不顾民生,重政治而轻防疫。蔡英文忙着在脸书宣传八月底投票“反公投”,而苏贞昌也赖着脸说:“人民不能再松懈,该收心了。”更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感。

《亚洲周刊》刊载邱立本题为“保护人民生命权是民主的真谛”的文章称:“天主教会信徒的警惕,要避免魔鬼的诱惑,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人类生理与心理上的脆弱,要防止犯下七宗罪,否则就会像那些折翼的天使,从天堂掉到地狱。”劝台湾当局向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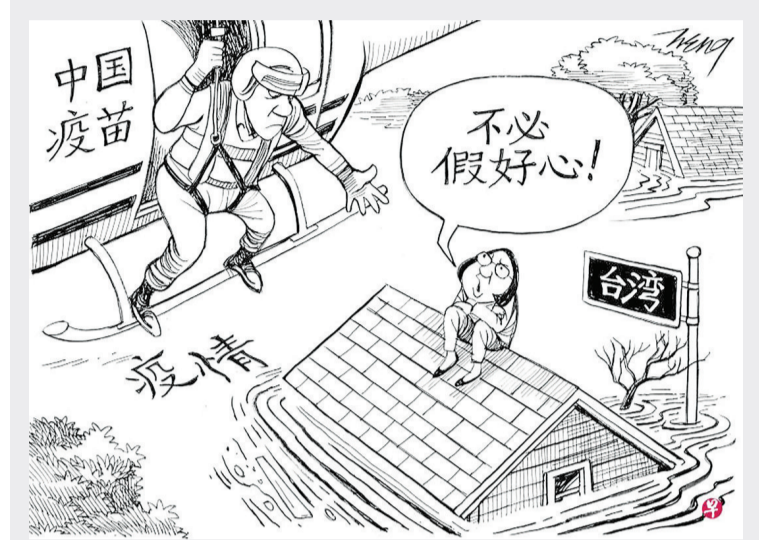
但如今,天堂离台湾更远了。邱立本写道:“台湾正陷入疫情失控的深渊。民进党在反中的主旋律中,志得意满,自认是全球防疫的优等生,没有作出深层的防疫工事,没有及早准备疫苗,最后疫情来袭,全部乱了套。”“在众声喧哗中,政治的原罪就是让人民失去了生命权,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疫情肆虐,让人民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

这次疫情是一面照妖镜,映出民进党当局无能、腐败的真面目,绿营政治人物长期以来自诩为“民主的天使”,骄傲自大、排斥异己、独断专行,犯下政治的原罪,让民众的生命权受到威胁。从陈时中到党内大佬,都要面对选民的审判,被驱逐出权力的“天堂”。

5月20日是蔡英文执政5周年纪念日,岛内各界出现检讨声浪。雅虎奇摩以“自华航诺富特(Novotel)暴发群聚感染以来,你对政府防疫政策的满意度是……?”为题进行调查,结果72.8%的受访者“完全不满意”,17.1%“不太满意”。民进党面对缺民心、缺疫苗、缺水、缺电、缺德、缺市场的困境,加上台铁悲剧、黑道入党,

《中时晚报》社长陈国祥评论:“台湾自己政治挂帅,还怪别人‘政治介入’,这种甩锅做法跟特朗普没有两样。”台湾赖岳谦、赵少康、邱毅、黄智贤等学者、名嘴也对“一切抹红”的言论深表不齿。岛内网民吐槽:“民进党哪有防疫专家?都是些‘文艺专家’。”“绿色是说谎的颜色。”

众所周知,绿营、绿媒和网军对“不同声音”围追堵截,对“去中国化”不遗余力;对台铁、凤梨尽力粉饰,对美国莱猪、福岛核污睁眼闭眼,对疫情实况“睁眼说瞎话”;还厚颜地以“民主的天使”自居。如今,天使折翼了,这不是上苍的警示?善恶的因果?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峇厘印度教祭神仪式中的铜钱 (1)

■ 德瓦·诺曼·普德拉·哈尔塔万 (Dewa Nyoman Putra Hartawan)

峇厘岛印度教徒在崇拜他们独一无二的神——三相神 (Ida Sang Hyang Widhi Wasa)时,不再满足于只祈祷却不祭祀,他们希望能以祭品的形式向真神祷告。在印度教中有5种祭祀仪式,被称为潘查雅尼(Panca Yadnya,意为五种仪式),即祭神礼(敬奉所有神)(Dewa Yadnya)、圣人礼(敬奉所有的修道者,隐士和印度教学者)(Rsi Yadnya)、祈灵礼(祭奠祖先亡灵)(Pitra Yadnya)、祷礼(为人类献祭)(Manusa Yadnya)和避邪礼(用神圣的祭品敬奉宇宙神灵)(Bhuta Yadnya)。



印度教的弥撒大典

在巴克提玛伽(Bhakti Marga)(一种祭典仪式)中,祭品在祭祀仪式中非常重要。祭品可以是植物,如花、嫩椰叶、水果、薯类和各种叶子;可以是牲畜,也可以是其它物品,例如中国铜钱。

中国铜钱在乌帕卡拉(宗教仪式Upakara)中是被当作通行货币来使用。从荷兰盾(荷属东印度)到印尼盾(印度尼西亚)再直到现在,货币的更迭都不能动摇中国铜钱在祭典仪式中的地位。尽管有山寨铜钱出现并且价格更加便宜,但

是峇厘岛民众从没想过用别的货币来替代中国铜钱。在“对印度教各个方面

的统一阐释”研讨会中表明,具有交换价值的官方货币就可以作为祭典祭品。然而,峇厘印度教信徒仍坚持使用中国铜钱,这是为什么呢?

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与努山达拉群岛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关系。汉代时(公元前206—220年)中国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地区,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进行贸易。爪哇,苏门答腊和峇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地区之一

(Holing, 爪哇岛)的东边,马里古(Mali-ku)的西边,南面是大海。当地风俗习惯与河陵几乎相同。稻谷一年两收,当地居民用贝叶(Daun Lontar)记事。若有人离世,当地人会在死者口塞金子,手和脚戴镯子,涂上香料后火化死者遗体。”根据这段记载并结合现今仍在峇厘岛流传的习俗,W·P·古伦菲尔德认为达瓦帕坦就是峇厘岛。

从考古发现的汉唐到宋代铜钱也可以侧面表明中国和峇厘的联系。峇厘当地人称这些铜钱为吉纳·查币(Jinah Japit音译)。

在峇厘当地流传的一些民间故事也反映了明代中国和峇厘的关系及峇厘岛中国铜钱的使用,比如峇厘国王与中国姑娘结婚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孔远志(Yuanzhi Kong)(1993年)的版本就描述了郑和(三宝公)使团在峇厘短暂停留的故事。在停留期间,使团带来了永乐年间的铜钱。使团中有一位姓“江(Kang)”的福建方言的厨师,因为巴杜尔湖(Danau Batur)的美景,也因为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峇厘少女,他选择了在京打马尼(Kintamani)定居。厨师娶了这位少女,还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江金华(Kang Kim Hoa音译)。江金华后来因为中国姑娘的身份而声名远扬,也因为美貌,她被巴杜尔国王(Raja Batur)娶为王后。

这位中国姑娘的父亲教会了当地人耕种和经商。因为她父亲的功绩,王后被尊称为伍拉·苏班达尔王后(Ratu Nguh Subandar)。王后去世后,当地居民为了纪念她,在巴杜尔王宫(Pura Batur)外修建了一座庙宇,后来发生了一场导致很多人死亡的瘟疫,当时这座庙被迁至宫内,而瘟疫却在庙被迁进宫后消退了。自此之后,铜钱在此地被当作祭祀用品。

阿尔诺德·林庚(Aernoud Lintgent)(格德·阿贡,1989)(Gede Agung),荷兰人,于1597年到访峇厘岛,他的著作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峇厘和中国的关系。除了描述国王个人,他还在书里刻画了当时雄伟奢华,放满武器和金器的王宫形象。据作者的一位在朝中当官的朋友说,制作这些金器的黄金都来自中国。林庚(Lintgent)同时也描写了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就包括了有孔铜币在峇厘岛的使用。

19世纪,许多中国人移民到峇厘,尤其是到峇厘北部(Bali Utara)的布勒冷县(Buleleng),于是这个地方就有了唐人街。布勒冷县的华人以高超的经商技巧得名,拥有崇高的地位,国王也往往任命华人为港务长。港务长掌管港口税收,反过来港务长必须向国王缴税。

港口和贸易的影响 自古以来,因为占据了战略性的位置,峇厘的诸多港口在各岛甚至是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从塞迦纪年987年的AIV边界碑(Prasasti Sembiran)记录中得知,摩纳婆(Manasa)港口自阿纳翁翁苏国王(Raja Anak Wungsu)时期起就已经存在,当时该港口用来停靠临近地区前来的商船。在9-13世纪时期,摩纳婆港口在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后摩纳婆港口发展成为峇厘北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外国商人

如中国或印度的商人与当地的贸易联系紧密也就不足为奇了(Setiawan, 1997:115-117)。通过这些贸易关系,中国铜钱作为交易货币为当地人所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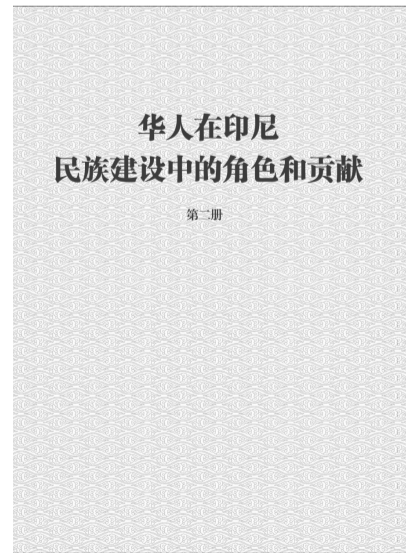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在满者伯夷时期(Majapahit),很多峇厘商人在图班(Tuban)、锦石(Gresik)和泗水(Surabaya)等地的繁忙港口经商。在满者伯夷(Majapahit)时期,中国铜钱就是官方的交易货币。在仓古(Canggu)或惹班(Trowulan)发现的一些写着1358年字样的石碑(Pigeaud, 1960:160-166)和刻有1366年字样的比鲁陆碑文(Prasasti Biluluk音译)就能证明这一点。中国铜钱因此随着这些商人流入了峇厘。

19世纪时峇厘的经济几乎全被中国人和布吉斯人(Bugis)掌控。在峇厘南部的库塔和峇厘北部的布勒冷,桑西特(Sangsit)和特姆库斯(Temukus)地区的港口地区,这些商人们利用小型船只只运来峇厘岛民众所需的货品,如鸦片、黑儿茶(Gambir)、纺织品、铜钱、铁器、火药和枪支。他们用这些商品来交换峇厘的农产品。如大米、椰油、烟草、皮毛、牛、棉、咸蛋、肉干和峇厘纺织品。

对峇厘民众来说,大米是最重要的农产品。中国和布吉斯商人把大米从峇厘运往新加坡,然后再运往经常遭受饥荒的中国。铜钱,又被外国商人称做“皮哲斯(pijes音译)”,是峇厘的官方货币。这些铜钱是从中国直接运往峇厘的,因为这样运来比在当地铸造铜钱便宜。因此在当时铜钱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Gde Agung, 1989:17-18)。实际上,铜钱不仅仅是货币,更是一种商品。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前言



移民不仅带来了人口,也带来了原籍国家的文化、艺术和体育。不论是一块织布、一餐一饮,还是表演艺术、体育和武术,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在努山达拉群岛(Nusantara)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土生华人群体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态度也十分开放。他们接纳了西方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古典音乐、爵士乐、芭蕾舞、电影、美术、漫画、摄影等。他们的辛勤付出不仅丰富了印尼的艺术形式,也为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值得强调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起,华人已在电影领域开创了先河。他们有的成为了导演,有的是编剧,有的是演员,有的是技术人员,



本书发起人 汪友山(已故)



本书总策划兼总编辑 廖建裕

有的甚至是影院老板。对于印尼的传统艺术,如峇迪布、克里斯剑、皮影戏等,土生华人也很感兴趣并潜心钻研,由此还诞生了许多爪哇文化艺术家,如曾祖沁(Tjan Tjoe Siem)和莱德宣(Go Tik Swan)。源自中国南方的哇扬布袋戏(Wayang potehi)在爪哇地区非常流行,并成为了印尼戏剧的一部分。而美食,则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影响。不论是食

物的形状,还是中华料理的食材,皆可在今天的印尼美食中得以体现。在现代体育领域同样如此。华族一直致力于发扬强身健体精神。就羽毛球而言,华族运动员对印尼羽毛球实力的提升助力良多,而羽毛球,已经成为了印尼民族的代名词。换句话说,他们通过在羽毛球赛场上的奋勇拼搏来参与印尼民族主义的巩固和增强。



用作交易货币的中国铜钱(峇厘,1912年)

悼袁隆平 荷兰:许菁裁 杂交稻父袁隆平,种子随身去远行。大爱人间真菩萨,泪洒全球留盛名。浪费食粮不可有,粒米农夫汗泪耕。造福人间不愧国,民族脊梁不负生。 经历饿殍哀声,一穷二白咬牙撑。金元难换馒头贵,水稻梦中覆盖征。袁公极乐笙歌接,天边闪耀隆平星。千秋惠泽伟功绩,痛失悼亡留典型。